

山東五運人物傳

武中奇題



9.152

K829.152

3

2

山东工运人物传

山东省总工会 编

B080/1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B

107001

山东工运人物传
山东省总工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4插页 154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209—00365—7

D·88 定价：3.10元

序 言

高克亭

继《山东工人运动史》成书之后，山东省总工会又组织力量编写了《山东工运人物传》，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山东工人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收入，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具体表述了这些革命前辈为中华民族和党的事业顽强奋斗、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从而使山东工人阶级的丰功伟绩与山东工运领袖的光辉形象相映生辉，得到历史的再现。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求得进步与发展，都会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历史经验的汲取与借鉴，一方面可以从宏观角度着眼，从大量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过程和结局中分析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较为细致地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活动，加深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人们从历史人物传记中所汲取的教益，往往是更加具体、生动的。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农民和其他革命的阶级、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历史。在这一革命历史进程中，有无数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为了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本书所列的35位山东工运先驱，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她）们有的在旧军阀和国民党白色恐怖肆虐的年代，积极发动领导工人

群众进行罢工斗争，被捕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有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组织建立工人抗日武装，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以身殉国；有的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终致积劳成疾，为革命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四处奔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然勤勤恳恳，努力不辍。正是由于老一代革命家的英勇奋斗与牺牲，才换来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成为新社会主人的今天。这一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近40年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腐朽反动的旧制度、旧秩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则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和完善新制度、新秩序。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宗旨是没有变的，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没有变的。工人阶级以天下为己任，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在今天仍应发扬光大。

褒扬工运前辈们的光辉业绩，对广大工人、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山东省总工会编写本书的目的。《山东工运人物传》的出版，为我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全省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中、青年工人，都应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从中了解本阶级在旧中国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事迹，学习继承工运前辈的优良传统和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为振兴山东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1988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高克亭	1
王荷波	刘明义	1
李慰农	周庆本	5
郭恒祥	刘明义	15
傅书堂	四方机厂史志办	24
纪子瑞	张国立	31
胡信之	臧 淼 张绍麟	40
陈少敏	李 尹	47
赵鲁玉	李 尹	53
伦克忠	张绍麟 臧 淼	62
徐子兴	马本基	68
李西山	庄明光	73
王明斋	寿杨宾	78
薛文英	李成才 陈福彭	84
宋伯行	刘明义	89
李广义	李成才 关传铭	93
朱锡庚 史得金	刘明义 盛 光	97
李敬铨	刘明义	102
张天民	陈曰武	110

邹光中	郑 敏	122
许光明	徐文生	129
张德水 车锡贵	赵振琳 冯作玉	137
高光宇	郑 敏	144
梁振环	刘元熙	150
蒲文泉	赵振琳	154

张福林	李修杰 苏任山	160
田位东 郑乃序	李修杰 苏任山	171
鹿广连	于长禄	178
洪振海 刘金山	李修杰 苏任山	181
杜季伟	李修杰 苏任山	188
王志胜	李修杰 苏任山	193

许德臣	孟庆良	198
编后		203

王 荷 波

刘 明 义

王荷波（1882—1927），原名王灼华，188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现福州市），由于家境清贫，姐妹都送进了外国教会办的育婴堂。受生活所迫，王荷波19岁只身背井离乡，流落到海参崴、哈尔滨等地做苦工。1916年又到津浦铁路南京浦镇车辆厂做工。由于他为人正直热情，很快就和工友们打成了一片，并逐步有了较高的威望。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王荷波，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劳动者》等进步刊物，激发了他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1920年，他在浦口发动工人筹建工人俱乐部，并成为主要负责人。1921年浦镇车辆厂组织成立了“中华工会”，他被推选为会长。他热心为工人做事，办起了合作社、浴池等福利事业，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为了联合津浦铁路工人的斗争，王荷波于1921年夏，又到津浦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活动，会同王尽美等人组织了山东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工人俱乐部，并办起了工人夜校。王荷波和工人的关系处得很好，他常和工人一块在小铺里吃饭，也常和工人在一起玩牌下棋，并亲自给工人夜校上课，工人们都尊敬地称他王老师。

1922年6月，王荷波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浦镇车辆厂就建立了党的支部，王荷波被选为第一任书记。

1923年2月1日，王荷波作为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的代

表，在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吴佩孚反动军阀当局的破坏，从而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王荷波同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工会代表、共产党员李广义等，在参加了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就辗转天津、沧州、德州、济南各站，进行演讲宣传，揭露军阀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罪行，动员各站工人准备举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王荷波回到浦镇后，立即发动浦镇车辆厂工人举行了声援罢工。英籍厂长奥斯登收买工贼，并派出武装人员破坏罢工。王荷波身先士卒，带领工人勇敢地开展了卧轨斗争，从而粉碎了敌人破坏罢工的阴谋。后不久，王荷波被厂方开除，并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事革命活动，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自1921年王荷波在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建立工人俱乐部后，就经常不断地到济南活动，特别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济南还经常给山东青年团干部讲形势课，指导党、团工作。1923年春，王荷波受党的派遣，化名满玉纲，到青岛四方机厂秘密从事工人运动。此时，该厂刚刚成立了工人自发组织的行会组织“圣诞会”，会长郭恒祥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王荷波以“五路联合会”（即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大铁路工人联合组织）的名义和郭恒祥接上了关系，开始对郭恒祥及傅书堂、丁子明等工运积极分子进行革命教育，启发其阶级觉悟。1923年农历二月十五，是“圣诞会”圣诞日，参加“圣诞会”的工友们在厂里扎起棚架，演戏祭祖庆贺，以此来联络工友们的感情，加强工友之间的团结。王荷波针对“祭祖”活动对郭恒祥等圣诞会的负责人说：“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就好，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但是，不能光花工人的钱（指收的会费），要给工人多做事。”在王荷波的教育帮助下，不久，“圣诞会”就在厂内建立了俱乐部和图书

室，还印发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简章主要内容为：办工人学校；工人要团结互助；工人要互相友爱，互相交流学习技术等10条。在王荷波的引导下，“圣诞会”参加了“五路联合会”，成为党领导下青岛市最早的工会组织。从此，“圣诞会”就由一个工人自发的行会组织，转变成为一个有明确政治目的、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阶级组织。

1923年6月，王荷波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又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此后，中央调他到上海担任上海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1924年，王荷波与李达等5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李达作了中国文化运动的报告，王荷波作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1925年2月7日，王荷波担任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和1927年在第三、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7年，王荷波在上海协助周恩来等领导了上海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了监委主席的职务。是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王荷波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上，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并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计。

“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领导，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王荷波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8月9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政治分局，王荷波担任了北方局书记。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王荷波与担任北方局秘书长的蔡和森相继到达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北京。王荷波不畏艰险，积极恢复

和整顿北方各级党组织，组织工人运动，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1927年10月13日，王荷波在北京召集党的秘密会议，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奉系军阀逮捕。王荷波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同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与段百川等18位同志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杀害，时年45岁。

王荷波牺牲后，1927年12月26日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第11期上，刊载了《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的文章。文章简介了王荷波的生平，高度评价了王荷波的功绩，说“王荷波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工人领袖之模范，王同志之死使中国工人阶级失去了一有力而忠实的领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勇敢而努力的战士，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是誓必继王同志之志，完成中国的革命，以慰王同志及同时死难之十八同志的！”。该报在1928年1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上，又发表文章介绍了王荷波、吴可等十八烈士英勇就义时的情况，文载：十八烈士“临就义的时候，还大声的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吓得一般小走狗手足无措，也没有敢请他们跪下，就枪毙了，这是何等的雄壮与沉痛啊！”。

新中国诞生不久，为了纪念烈士的功绩，昭垂后世，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特组织了“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于1949年12月11日，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移葬仪式及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并讲了话。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讲述了烈士的事迹。他说：“王荷波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工人出身的同志，他是一贯站在正确道路上的”。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扶柩移灵于墓地，为下地后的遗骸覆土，王荷波是第一批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英烈。

李 慰 农

周 庆 本

李慰农（1895—1925）原名李尔珍，安徽巢县油坊郑村人，1895年生。他自幼生活在贫苦农民中间，目睹农村破产和农民流离失所的惨状，立志要拯救广大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年，他鄙弃社会上歧视农民的风气，毅然报考了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正式改名“慰农”。在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他以天下为己任刻苦攻读，日益精进，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农场管理员。那时，他曾天真地设想要以农场为基地，探索改造中国农业的出路。但是，当他受到安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高语罕的启发，特别是聆听了恽代英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讲演后，李慰农开始认识到，“农业救国”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慰农是芜湖学界的领袖人物。他奔走呼号，促进芜湖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推动了芜湖爱国运动的发展。时值江西宜丰县农民为反抗土豪劣绅，举行芳溪暴动，他闻风而动，参加了这场斗争，写下了芳溪暴动的历史资料。不久，“华法教育会”在芜湖招收留法勤工俭学生。24岁的李慰农报名投考，并以第二名优异成绩列入了芜湖地区首批留法学生名单。12月25日，他告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新婚的妻子，前往法国。

在法国，李慰农进了蒙达尼一家制造鞋刷子的工厂做工，因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他边劳动边学习，刻苦钻研马克

思主义理论，悉心考察社会，努力自修法语、德语和俄语。虽生活清苦但其志弥坚。

1920年2月，他在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李富春等的影响下，联络本省的同学组织了“工学励进会”。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召开会议，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仅有18人，李慰农是与会者之一。1923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在国外期间，李慰农继续研究农民问题，经常为周恩来主编的《赤光》撰稿。由于他一贯关注农民问题，经常找留法同志探讨农民问题，被同志们誉为“农民博士”。

1923年底，李慰农被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周恩来亲自从巴黎陪送到柏林，并为他办好赴苏手续。

李慰农在党的培养下，在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故土上逐渐成长起来，时刻准备听从党的召唤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战斗。

1925年1月，李慰农奉党中央指示，回到了阔别五载的祖国。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急切地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到，要求分配工作。

1925年4月，李慰农奉命抵达青岛，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化名“王伦”来到四方工业区，不久，就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分别召开了四方机厂、各日本纱厂和水道局的党员、团员工人积极分子座谈会，将李慰农向与会人员作了介绍，听取了就目前工运工作的反映。接着便在四方机厂西公司工人宿舍建立了四方村党支部，李慰农任书记。

李慰农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很快就和他们建立密切关系。他的生活十分俭朴，甚至低于一般工友的水平。山东省委每月发给14元的生活补贴，他节省下大半照顾生活困难的工友。他孑然一身住在四方村荒野中的工棚里，大家都非常关心

他的食宿和安全。因他安徽口音重，工友们不让他出去吃饭，主动将饭菜送到住处；晚上去夜校讲课时，工友们对他倍加保护。

李慰农到青岛时，正是大康等几个日商纱厂的工人不堪忍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加紧酝酿罢工之际；而且在邓恩铭同志的具体领导和四方机厂工会的带动下，各厂已先后成立了工会。4月中旬的一天，大康纱厂秘密工会的会员名册被厂警搜去交给了日本资本家。资本家据此非法逮捕了三名工会代表，拘禁在厂内肆行拷打。全厂工人闻讯后十分气愤，提前停车收工，找到日本厂主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资本家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扬言要武力镇压。

李慰农听了大康纱厂工人代表的汇报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皖系军阀郑士琦的势力正受到奉系军阀的排挤，有被赶出山东的可能，而亲日派军阀张宗昌的势力正在进入山东，一时也无力顾及罢工，因而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应立即举行罢工。

4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首先吹响了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的号角，罢工开始后，李慰农一直置身于工人中间，密切地注视着日本资本家的动向，紧紧地掌握罢工工人的思想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罢工的当晚，他召开会议，组织了厂罢工领导机构，分设了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纠察、讲演、捐款分配、军警接待等十一个小组。

罢工领导机构向厂方提出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对工人一律平等等16项要求。对此，日本资本家不但拒绝而且勾结青岛反动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了大康纱厂，断绝了工人的饮食，封闭了工人宿舍，企图迫使工人屈服。虽然工人们一天只能吃到6个铜板的食品，并露宿街头，但战斗情绪

异常高昂。

日本资本家转而采取收买利诱、分化瓦解的诡计，扬言：“凡在罢工期间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增加工资八成；风潮将息先上工者，永远增加工资四成”。工人们仍不为所动。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李慰农又派人去各纱厂联络，支援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经过认真的准备，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的工友，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发表了宣言：“誓为大康纱厂工人的后援”。

同盟大罢工实现了 这对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是有力的声援。

为了动员社会舆论，四方机厂支部书记傅书堂拜访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请《公民报》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胡先生当即表示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赖，愿以笔为武器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展开斗争。随即在《公民报》第一版开辟《工潮专载》一栏，公开报道罢工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胡信之先生的正义行动大大鼓舞了坚持罢工斗争的工友。《公民报》也由此引起社会上广泛重视，销售量猛增。

在这期间，钟渊、富士等日本纱厂也相继举行罢工，6天之内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上万名。消息传出，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上海日本各纱厂工人发表了联合宣言，全国铁路总工会号召工人“以实力相助”。由于罢工声势迅速扩大、日本资本家再次勾结青岛反动当局企图出兵镇压，4月25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镇压罢工风潮。

在李慰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工人紧密团结，加之全市乃至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致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日本厂主迫

于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伤工人”、“不殴打及辱骂工人”等九项复工条件。至此，坚持22天的大康、内外棉、隆兴等3个日本纱厂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为了进一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广大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勇气，李慰农组织3个厂的工会于5月10日下午在四方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会后又举行了游行示威，以大康、内外棉、隆兴3个纱厂工会的牌子为前导，其后是乐队和长达数里的游行队伍，此举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瞿秋白当时曾撰文《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对这次大罢工予以高度评价：“这是青岛工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运工作，住在海岸路18号四方机厂西公司职工宿舍。李慰农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刘少奇指出：“青岛的工人阶级经受两代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生活格外苦，应该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这样才有伟大的力量。党的活动要严些，但是必须把工会抓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齐动；停，大家一齐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刘少奇还分析了目前形势的可能发展趋势，认为“这次纱厂罢工虽然取得胜利，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李慰农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对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作了认真的总结，使大家认识到，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的胜利是暂时的，日本资本家决不会甘心失败。必

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果然，复工后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制造种种借口向工人挑衅，并用收买拉拢等手段对付工人。对于经过大罢工斗争锻炼更加巩固的工会，日本厂主更是十分痛恨。他们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用手枪打伤数名工人，勾结军阀扣押工会办事人员，开除工人代表50余人。全体工人在李慰农的领导下，团结得更紧密，工会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更加强大和巩固了。同时，李慰农也预感到，日本厂主用经济和政治两种手段都未能阻止工人的罢工斗争，下一步很可能使用武力镇压。

事态的发展不出李慰农所料，5月25日，青岛反动当局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决定先解散3个纱厂的工会，李慰农得知后，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工会文件一律收藏好，停止办公一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厂同时停车不出厂，直至牌子归还为止。

25日下午，青岛市警察厅长陈韬气势汹汹地亲率大批军警包围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各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也不断向工人开枪示威。这时，工人们忍无可忍，情绪十分激愤。3个纱厂的工人全部停车罢工，抗议日本厂主勾结警察厅镇压工人的罪行，当陈韬窜到车间向工人训话时，遭到了工人异口同声的斥责，并坚决要求归还工会牌子。陈韬在工人的严厉斥责下，直到晚上9点才不得已归还了工会牌子，悄悄溜走。

第二次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惊慌。5月2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约见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请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军队”，去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同时又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手段，实属势所当然”。5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由旅顺口派出“樱”、“桦”两艘驱逐舰到达青岛，并从佐世保派出“管